

宋代日记的枢纽地位和“近代指向”^{*}

李 贵

摘 要:中国传统日记“始于唐而盛于宋”,出土秦汉简牍之系日记录文本未能动摇日记在宋代定型勃兴的既有认知,所谓“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元延二年日记”“王奉世日记”等都不是文体学意义上的日记,而是属于档案性质的行政文书。宋代是日记著述的文体自觉和定型时代,其作品较前代有重大变化和突破性进展,对后代有持久启发和影响,承前启后,在中国日记文学史上处于枢纽地位。在自我审视和第一人称叙事、心理描写、日常化和世俗化、近代汉语的使用、读写的庶民化和文化权力下移等方面,宋代日记发展出若干“近代早期”的因素,具有“近代指向”。考察日记这一“微观史”和“个人生命史”的载体,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宋代作为“中国式近代”的独特性。

关键词:秦汉简牍;宋代日记;枢纽地位;“近代指向”;中国式近代

DOI: 10. 11714/jssu. sse. 202605004

当前日记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再出发”的态势。“再出发”首先需要“再回首”,不仅要反思学术史,还要重构中国日记的演变过程,尤需重视宋代日记。陈左高评述历代日记变迁史,称“日记一体,始于唐而盛于宋”^①,论者多从其说。但近年一些出土秦汉简牍似乎对此说构成挑战,已有成果对宋代日记在传统日记发展史上之枢纽地位和“近代指向”也缺乏明确认识,兹尝试论之。

一、秦汉简牍之系日记录文本并非私人日记

吴承学主张古代文体学研究要“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②,其说对日记体式的研究也富于启发性。关于日记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轨迹,张剑已结合最新出土实物和传世文献对关键坐标点作了简要述评,确认日记是在宋代定型勃兴;其中谈到,秦汉简牍多有系日记录的文本,学界对其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未有共识^③。本节试作补充论证。

学界关于中国日记的起源、发展、定型问题长期存在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对日记体式的判断标准不一致。“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牢固传统,而文体定式是一个追认的过程,即从大量的同类作品中概括出基本体式,然后往前追溯,找到最早符合此体式的某作品,即可认定为该体式的定型作品。通过中外比对,今人对著述意义上的日记体式的广泛共识是:私人撰写、自身视角、先标日期、次

^{*} 收稿日期:2025—12—31

作者简介:李 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① 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第38页。

②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③ 张剑:《中国传统日记的源起、发展和类型》,《传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记天气、杂记叙事、定期写作^①。此六要素中,私人从自身视角出发逐日记事最为关键,天气记录未必要有,也未必要放在叙事前面。

循此标准,秦汉“质日”类文书对日记的发展有先导作用,但仍非文体学意义上的日记。各地所出秦汉简牍,多有自题“历日”“质日”或“日”者,或被今人称作“历谱”,本是朝廷颁行全国的历日简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些官吏在某些干支日期下记录当日的行政事务^②。如湖北荆州周家台30号秦墓简牍,其中有六十四枚竹简,上书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全年十三个月(含闰九月)的日干支,被整理者命名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每一枚竹简自上而下分作六栏(闰九月分作五栏),每栏记一日干支,某些日期下有记事文字,“因限于位置空间,有的日干支下的记事是分行书写或者倒书在该日干支之上”^③。单纯从文字形式看,有记事的部分很像日记,如二月里连续三天的记事:“二月丙申宿竞(竞)陵。丁酉宿井韩乡。戊戌宿江陵。”^④但记日和记事其实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别书写的。赵平安指出,从原简字迹看,“记事文字和干支文字有些墨迹有浓淡不同,有些字有大小之别”,特别是有的记事文字分两行书写,有的文字转到干支上倒书,“均系预先留空不足所致,说明记事文字是后来写上去的”,“像这样把历谱预先编好,干支下留空记事的竹简”,尹湾汉墓也有发现^⑤。也就是说,秦汉“质日”文书是先编写好历日(或称“历谱”)、后有官吏在相应日期下添加文字记事。事实上,“质”的意思是对质、验证,这类“质日”简册的核心内容是“行程日期记录”,用来判定官吏是否在规定日期内完成工作任务,其性质是官府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⑥。可见质日是行政文书,并非私人日记。更有甚者,质日的有些记事内容是事后追补记录及事前预先记录,而且有些预先记事很可能并未实际发生^⑦,这与日记要当天随手记录的性质更是相去甚远。

学界所谓“元延二年日记”也难称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1—76号竹简记于西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整理组据简册内容和同出的墓主人师饶随葬清单上“记一卷”之语,将该简册定名为《元延二年日记》^⑧,恐怕欠妥。从形制、字体和墨迹的差异判断,该简册内容也是先有官方历日、后有官员添加文字记事,和其他秦汉质日属于同样性质的行政文书,“记一卷”之“记”更可能是秦汉流行的记述类文体“记”,而不应直接命名为“日记”。前引赵平安文结合《汉书·艺文志》和文体学史,认为该批随葬简册和前述“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一样,都是为了凸显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命名为“元延二年记”“更忠实于它本来的名称”,而“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也应称作“秦始皇三十四年记”。所论较稳当。

由此可以重审扬州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中所谓“王奉世日记”的性质。墓主王奉世的下葬年份是广陵王刘胥四十八年,当西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考古简报将其中写有日期和事件的一件木牍称为

① 参见吴承学、刘湘兰:《杂记类文体》,《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Miriam Nandi, *Reading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Diar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17-30。

② 徐世虹等:《秦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③ 彭锦华:《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文物》1999年第6期。

④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图版见第11页,释文见第93页。

⑤ 赵平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定名及其性质——谈谈秦汉时期的一种随葬竹书“记”》,《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6—286页。

⑥ 详见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溯源探索》,《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吴雪飞:《秦汉“质日”性质再探》,《史林》2023年第4期。

⑦ 黄浩波:《睡虎地汉简〈质日〉中的追补记事与预先记事》,《出土文献》2023年第4期。

⑧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1—67、138—144页。

“日记牋”,判断“这是私人记录”,很可能是王奉世入狱后“对前往探望(营救)他的人的记录”^①。自1980年发现以来,学者对这片木牋是私人日记还是工作记录、是狱中日记还是官府文书作出各种不同解读及猜测,迄无定论^②。今按:“日记牋”的一面从右至左书写了12行文字,每行均先记序数日和干支日(有4天未写干支)、接着简略叙事,如“十一月二日,道堂邑人口”,“十二月十三日甲午,徐延年行,陈忠取狗来”^③,表面看已是日记的雏形,但实际上不是日记,更不是私人日记。

首先,倘若理解为王奉世坐牢时的日记,那么西汉时官府会允许那么多人从各地频繁前来探望囚犯吗?当时一个囚犯是否拥有私自记事的权利、如何获得书写材料、又如何被允许将私自记录的木牋带走?这些疑问难以解答。

其次,该木牋的内容是择日、择事而记,两个月里只选择了十二天作记录,最后一行的右边尚有空白,说明记录者认为无须记录时连日期都不写,并非连续或有意识地定期写日记。

再次,该墓中有用于向地下鬼神通报墓主身份及随葬信息的木牋,整理者命名为“文告牋”,实为告地策,末尾云:“广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狱事,事已,复故郡乡里,遣自致移柩(诣)穴。卅八年,狱计、辟书从事如律令。”^④墓中同时出土有“臣奉世”“王奉世印”等铜印,又使用广陵王刘胥在位年数纪年,知王奉世本为广陵国官员。据秦汉简牋材料,“狱”的基础义是争讼、诉讼,“狱案”是有关狱讼的案例,“狱计”则是“有关狱案统计上报的材料或卷宗”,每年须上报^⑤;“辟书”是审理、调查犯罪的文书,辟书和疑难案件的奏献文书、申请再审的乞鞠文书等皆须由县廷呈报郡守乃至中央政府相关部门^⑥。准此,告地策大意是官员王奉世曾处理过诉讼案件,现在由他自己把处理狱案的档案材料带到地下交给鬼神,一如他生前任职时呈报上级。前述尹湾汉墓随葬清单中的“记一卷”,即指随葬的《元延二年记》,类似地,此处“狱计、辟书”也属于随葬品一类,“日记牋”即其中之一,当系王奉世生前处理狱案时记录的档案文书。故该木牋不是私人日记,而是官员处理诉讼案件时的工作记录,其性质属于官方文书。已有研究忽略了“狱计、辟书”的材料,文体意识也不明确,故对其性质判断有误。日记研究,当以“辨体”为先。

最后,“日记牋”的另一面只写了六个连续的干支日期,笔迹粗细浓淡与正面差异甚大,此外全是空白,没有记事,很可能和前述秦汉质日一样,此面本是正面,是朝廷所颁历日的一部分,王奉世在其背面记录处理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备查验和给上级报告。

总之,该片木牋不是私人日记,而是官员处理诉讼案件时的工作记录,其性质属于官方文书,不应称作“王奉世日记”。目前学界多将东汉马第伯原文已佚的《封禅仪记》视作日记之先导,公认中唐李翱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来南录》为存世的最早日记,“且为宋代以后日记作者所沿袭”^⑦。综上可知,此判断仍旧可取。

二、宋代日记的枢纽地位

既然新出材料未能动摇本文开头所引日记“始于唐而盛于宋”的文学史认知,那么可进一步肯定宋

①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② 田天:《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牋的再认识》,《出土文献》第3辑,2012年。

③④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江苏连云港、扬州新出土简牋选》,东京:每日新闻社、每日书道会,2000年,第183,185—187页。

⑤ 陈松长:《再论秦汉时期的“狱”——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⑥ 彭浩:《读张家山汉简〈行书律〉》,《文物》2002年第9期。

⑦ 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第5—6页。

代日记在传统日记发展史上之枢纽地位。

一是宋代日记相比前代有变化、有发展,并最终定型。南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5“赵清献公充御试官日记”条,完整抄录了北宋赵抃嘉祐六年(1061)充任殿试编排官期间所撰日记,刘跋云系“日记一卷”,乃自家珍藏之赵抃手书^①。赵抃《充御试官日记》虽出自南宋笔记转录,但据今人考证,该书真实可靠^②。此日记一卷,并非官方要求的工作档案,而是作者自觉撰写,含自注在内共718字,连续13天无间断,从私人视角记录了科举殿试的全过程及考官的日常饮食。除第一天外,其余12天皆有天气记录。全卷逐日记事,散体行文,先标日期,次记天气,后录事实,书写程式始终如一^③。日记六要素在这里已完全具备。黄庭坚作于崇宁四年(1105)的《宜州乙酉家乘》,曾被今人视为“自创格范”,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记”^④,现在看来,改为“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常生活日记”更准确。

赵抃和黄庭坚的这种写法在南宋已成为日记写作的典型方式。如楼钥的《北行日录》,有意识地完整记载天气,即使某天未记事件,也记录了天气^⑤。朱熹门人黄榦还专门写下《日记式》,为修身进学日记制定撰写格式,尤重天气和地点^⑥。可见宋人不仅在写作实践中创立了日记的完整型范,在理论上也体现出文体自觉。

宋代日记之兴与某些制度密切相关。日本学者早已指出,历日(历书)的广泛普及和形态发展,为北宋各种日记的出现创造了环境,宋代行程历、各种文书和账簿“历”的流行也促进了私人日记的勃兴^⑦;中国学者又结合修史制度中的“日历”体制揭示,“日记之兴,受到日历的直接启发与影响”^⑧。犹可补充,两宋各级官府均有财务收支历,按时间顺序每日登记钱物收支,书写格式是日期+事件^⑨;又,宋朝用沈括建议,建立“候簿”,每日观测、记录昼夜天气和气象变化,为制订可靠历法提供依据^⑩。各级各类官吏皆了解财务收支历和“候簿”,日记在宋代定型并勃兴,宋代日记强调记录气象变化和地点所在,彼此之间有无联系?迄今无人措意,值得探索。

日记在两宋的兴起还与“修身历”有关。已有学者通过分析《玉海》和《宋元学案》的材料指出,日记之兴与宋元士人修身治学流行“按日计划与践行”的“日课”存在密切联系^⑪。此论有理,但还有更早、更直接的材料。苏轼平生坚持做日课,谪居黄州时也不稍歇^⑫,而他本人就倡导过“修身历”。《东坡志林》

①③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5,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207,205—207页。

② 王瑞来:《赵抃〈御试官日记〉考释——兼论北宋殿试制度的演变》,《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按:赵抃日记之书名,王瑞来称为“御试官日记”,未能体现临时充任之义,另有学者称作“赵清献御试日记”(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2页),将作者谥号混入书名,且书名含义不明确,似皆欠妥,今据刘昌诗原书条目及日记实际内容,改题为“充御试官日记”。

④ 杨庆存:《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记——论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理论学刊》1991年第6期。

⑤ 李贵:《楼钥〈北行日录〉的文体、空间与记忆》,《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⑥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集部影印元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1a-b页。

⑦ [日]岡本不二明:《宋代日記の成立とその背景——歐陽修「于役志」と黄庭堅「宜州家乘」を手がかりに》,《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8号,1992年12月。

⑧ 邓建:《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⑨ 方宝璋:《宋代的会计帐籍》,《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⑩ 沈括撰,胡道静校正:《新校正梦溪笔谈》卷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⑪ 夏令伟:《元代日记及其形态论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⑫ 陈鹤:《耆旧续闻》卷1,《全宋笔记》第6编第5册,第42页。

有“修身历”条,记苏轼对苏辙言:“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①照此法记录,则为修身日记。吕祖谦乾道五年(1169)为笠泽书院制定规约,“肄业当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推,仍手书名于册后”^②。坚持记录此种日记簿、日记册,则为进学日记。后世教育学称宋人这种写作修身治学日记之法为“日记教学法”,世代沿用至今。

二是宋代日记不仅作者和作品数量多,而且出现了垂范后世的代表作。宋代不同身份的读书人中都有倾力写日记者。黄庭坚撰中下级官员王纯中墓志铭,载其从始学迄去世,持续写作《目录》48年,“游居欢悲,闻善见不贤,所自琢磨,无不疏记”,内容无所不包^③。黄庭坚晚年被贬宜州,在困苦至极的生存境遇中仍抱病坚持写日记,今存《宜州乙酉家乘》。南宋重臣周必大日记近50年,今存8部。又宋末国难之际,“隐南游北之士,多作目录,书所闻见游历,纪述颇详”^④。《宋代日记丛编》收录日记55种(含存、残、辑佚),可考知者犹多,作者和作品不可谓少,惜散佚者多。

宋代日记不惟数量多,题材类别(文类)也很丰富。一曰朝廷政事,周辉称“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⑤,即属此类。陈瓘奏请删修《神宗实录》时谓王安石《目录》(又称《日记》):“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册也……凡日历、时政记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⑥明言朝政类日记乃官员个人私下逐日随记,与史馆事后编次之日历不同。二曰科举活动,如前述赵抃《充御试官日记》。三曰行旅见闻,如欧阳修《于役志》记官员赴任过程,楼钥《北行日记》记出使见闻,周必大《泛舟游山录》记探亲旅行。周辉尝自述:“辉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虽数日程,道路倥偬之际,亦有日记。以先人晚苦重听,如干蛊次叙、旅泊淹速、亲旧安否,书之特详,用代缕缕之问。”^⑦此种“行记”文类是宋代日记的大宗。四曰日常生活,如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周必大《闲居录》、吕祖谦《庚子辛丑日记》等。五曰修身进学。苏轼所倡之修身日记,在南宋成为学者的自觉行为。朱熹门人王介尝作《目录》,《自序》云:“目录者,检身之法也。其不可书者,即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书,不至握笔齟齬不下,则不为小人之归矣。”^⑧与苏轼所言如出一辙。南宋学校教育中还广泛推行进学日记。福建延平郡学及书院规定,学生读书“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⑨,江西兴国县南湖书院亦“置进学日记,令躬课其凡,督以无怠”^⑩。以上五类,在具体文本里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有交叉。如曾布《目录》篇幅有“数巨帙”,主体内容是时政,其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⑪,亦多记日常生活。

日记要成为文体和文学史上的专门体类,根本上在于产生有影响力的佳作,作为该专类的旗帜,引起当时或后世的瞩目,从而才能在叙事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宋代日记已具备这样的条件,南宋至清末广受推崇的宋人日记至少有11部:欧阳修《于役志》,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张舜民《南迁录》(元以后

① 苏轼:《东坡志林》卷3,《全宋笔记》第1编第9册,第66页。

② 吕祖谦:《乾道五年规约》,《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5《家范五》,《中华再造善本》集部影印宋刻元明递修本,第2a页。

③ 黄庭坚:《宋故朝奉郎知洺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紫王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④ 郑思肖:《大义略叙》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60册,第97页。

⑤⑪ 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8,238页。

⑥ 陈瓘:《乞别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9册,第14页。

⑦ 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9,第406页。

⑧ 吴师道:《敬乡录》卷13,《适园丛书》本,第3b页。

⑨ 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6册,第212页。

⑩ 文天祥:《赣州兴国县南湖书院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9册,第188页。

称《郴行录》),郑刚中《西征道里记》,陆游《入蜀记》,范成大《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楼钥《北行日记》,吕祖谦《入越录》《庚子辛丑日记》等^①。尤其是,行记在前代绝大多数采用分程而非排日记事的方式,日记体行记到宋代才开始勃兴,“从此也确立了后来行记的主流体例”^②;修身进学日记乃宋人首创,既显示宋代文化重理、重学之特色,也开启后代同类日记之法门。宋代日记在文体发展史上的转型意义,于此可见一斑。至于现代理论所看重的日记的私密性、随意性、驳杂性、生命性等特点,更是由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一手奠定。宋代日记在体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一批典范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是宋代开始出现专门的日记题跋、评论并日趋丰富。宋前似无专门的日记阅读记录。宋代题跋繁富,日记勃兴,二者结合,遂有专门的日记题跋文字,名家名篇不绝如缕,叠加诗、文、笔记中的日记评论,意味着对本朝日记文体和作品的认可。

宋人的日记题跋涉及全部题材类型。对朝政类日记的阅读和评论最为常见,论者将日记作为史料和史学著述对待,多就日记作者及叙事真伪、政治得失、人物品格等展开议论和辩驳,表达政治态度和见解,其中围绕王安石《熙宁日记》的争论贯穿两宋,陈瓘抓住此书攻击、否定王安石及其政事,由此激化的新旧党争异常激烈,最终两败俱伤^③。读出使类日记,多重恢复之事,如晁载之解释抄录路振《乘轺录》之目的,是“以备他日辽人归我幽、蓟、并地之考”^④,陆游夜读范成大《揽辔录》,至中原父老见使者多落泪处,悲慨作诗,斥责求和派对故国人民犯下罪行^⑤。对其他类别日记则偏重文学价值和文化精神。关于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楼钥题跋时连发三问,对黄庭坚不以迁谪介怀、坦然面对得丧生死之笃定洒落人格再三叹赏^⑥,林希逸则在诗中以“珠玉”赞誉之^⑦。朱熹和周必大先后都写过《跋吕伯恭日记》,赞扬吕祖谦《庚子辛丑日记》^⑧,两篇题跋都肯定了日记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还揭示出日记所蕴涵的最高文化境界。宋代众多名家重臣反复题跋、评论日记,而且聚焦于史学、文学和文化价值,明确表明并显著提升了日记独立而重要的文体地位。

四是宋代传记在列举传主著述时多提及日记。前述黄庭坚撰王纯中墓志,称其坚持写日记48年,内容丰富,“读其书,可知其人有常度也”。用孟子“读其书,知其人”之语评价王氏日记,足见日记已跻身主流著述行列。墓志铭的这种表述在南宋尤为普遍。刘弥邵乃隐居不仕的普通儒学者,刘克庄称其“有《易稿》《汉考》《读书日记》”等各若干卷^⑨。吴炎为县主簿,包恢谓“其所著有《阳山猥稿》若干卷及《日

① 详见母忠华:《宋代日记辑评》,《宋代日记研究》附录五,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尹占华:《宋代日记文述评》,《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上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按:程卓《使金录》曾受好评,但据今人考察,其书乃抄袭范成大使金诗自注而成。详见胡传志:《别样的抄袭——南宋程卓〈使金录〉抄录范成大使金诗自注发覆》,《苏州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② 成玮:《百代之中: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③ 参见张其凡:《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宋代人物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360页。

④ 晁载之:《续谈助》卷3,《十万卷楼丛书》本,第4b页。

⑤ 陆游:《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22—1823页。

⑥ 楼钥:《跋黄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攻媿先生文集》卷74,《中华再造善本》集部影印宋刻本,第10b—11b页。

⑦ 林希逸:《读黄诗》,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232页。

⑧ 朱熹:《跋吕伯恭日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1册,第13页;周必大:《跋吕伯恭日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0册,第404页。

⑨ 刘克庄:《习静叔父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1册,第235页。

记》”^①。谢深甫高至宰相,张嗣古记其“有文集二十卷、《北征日记》二卷”^②。大作家的传记也是如此。范成大、周必大皆位至宰辅、著述宏富,可述者众,而周必大撰范氏神道碑,将三部日记与《石湖集》等著作并列^③,李壁撰周氏行状,亦将其八部日记逐一列出^④,楼钥撰周氏神道碑,撮述其著述大略,日记类别仍列出三部^⑤。不妨说,在南宋,对一个写过日记的读书人“盖棺论定”时列出其日记著述已成为书写体例,足见日记的文体身份已在宋人观念中普遍牢固地树立起来。无论身份贵贱和著述多寡,宋人传记在罗列著述时多提及日记,且与权威的经史类著作并列,则日记显然已被文人士大夫共同认可为一种独立的著述体式,具有“立言”性质和传诸后世的不朽价值。

五是日记从南宋开始多入别集。唐李翱文集“杂著”类收有日记体文章《来南录》^⑥,但一则它只是一篇不足千字的简略文章,二则在唐五代只是偶一见之,未成惯例,三则李翱集在宋前的编次原委和流传情况已无从得知^⑦,故不足为训。作者将日记收入本人别集,或始自南宋初期。郑刚中绍兴九年(1139)撰《西征道里记》一卷,五年后的绍兴十四年(1144),他自编文集,就将其收入《北山中集》^⑧。同在绍兴年间,一些北宋作家的单行本日记被编入其别集。司马光日记原有单行本一卷,绍兴间刻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则收入《目录》三卷^⑨。张舜民《南迁录》二卷初为单行^⑩,南宋人在临川雕印其《画墁集》时亦编入全集,时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之前^⑪。此后周必大对日记入集之风有极大推动作用。周氏于绍熙二年(1191)到庆元二年(1196)间主持搜集、编刻欧阳修全集,绍熙五年(1194)致书孙谦益,云搜访得“日记”《于役志》一卷^⑫,遂增入欧集。此法渐成惯例。周氏全集由其子纶及门客一仿欧集凡目体例编次而成,日记中部分内容因多及时事,托词而未全部印行,实已尽数收入集中^⑬。陆游自编《渭南文集》收日记《入蜀记》,告子曰:“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⑭特意嘱托其子于文集中刊行日记,足见重视此书,而专门拈出周必大编刊欧集之“例”,亦可证当时日记入集已成惯例。流风所及,北宋单行日记在此时也多被重编入集。陈襄《使辽语录》,乾道元年(1165)陈辉始刊刻单行,辉子晔又于庆元三年(1197)收入陈襄《古灵集》卷末^⑮。黄庭坚《宜州乙酉家

① 包恢:《吴主簿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0册,第6页。

② 张嗣古:《宋故少傅右丞相赠太师王谢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4册,第219页。

③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2册,第340页。

④ 李壁:《周文忠公行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3册,第410页。

⑤ 楼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5册,第300页。

⑥ 李翱:《李文公集》卷18,《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第1a—3b页。

⑦ 金涛声:《李翱集版本源流考辨》,《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1994年。

⑧ 郑刚中:《初集自叙》,郑刚中撰,任群、刘泽华点校:《郑刚中集》卷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540页。《西征道里记》见该集卷13,第241—255页。

⑨ 司马光撰,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⑩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79页。

⑪ 周紫芝:《书浮休生画墁集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2册,第192页。

⑫ 周必大:《与孙彦执谦益书二》,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9册,第252页。

⑬ 周纶:《周益国文忠公集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2册,第221页;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題》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1页。

⑭ 陆子通:《渭南文集跋》,陆游撰,朱迎平笺校:《渭南文集笺校》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533页。

⑮ 陈襄:《使辽语录》,《全宋笔记》第8编第10册,第16页。

乘》初未入集,黄铢访求遗阙,于嘉定戊辰(1208)编入《豫章先生遗文》刊行^①。这些别集,或系作者手定,或由家人门生编次,或为后人补遗,而皆将日记编入其中,颇可代表南宋一代之风气,表明时人日记文体的自觉意识已非常强烈。

综上可见,日记在宋代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完全成熟、独立并具有文体典范性,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创新和演进态势,框定了后代的写法。宋代是日记著述的文体自觉和定型时代,大批文学名家和普通文人投入日记的写作、编刻、阅读和评论,日记文本传播的广度和跨阶层影响力明显增强。宋代日记较前代有重大变化和突破性进展,对后代有持久启发和影响,承前启后,在中国日记文学史上无疑处于枢纽地位。

三、宋代日记的“近代指向”

中外史学界曾流行一个说法,称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或“近代早期阶段”^②。王水照则从文官政治、官员出身、权力分割及制衡、民主思想、自由论政、学校制度、太学生运动等方面具体考察,认为宋代社会的确包含了一些指向“近代”的新因素^③。循此思路看,宋代日记也具有有一些“近代指向”的因素。

第一,自我审视和第一人称叙事。日记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回忆当天之事,是一种自我书写实践。每一次书写,都是对过去自我的反思、对当下自我的确认、对未来自我的预期。其中的“我”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三组自我:“当下的我”与“回忆的我”,“当下的我”与“反思的我”,“现实的我”与“期待的我”,每组当中的“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彼此面对。在日记这个私密空间里,作者将自我客体化,进行持续的自我对话、自我审视和自我剖析,从而建构起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宋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内省而广大”^④,日记的自我审视也属于这种内省文化的一部分,而这正是近代以来叙事文学中人的“内在性”和“自我意识”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实践。

试举数例。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作于贬所,其中记录生命末年仍坚持有规律地外出沐浴;在229天的日记中只记日期和天气者多达76天,且越到后来越密集,表明其日常生活和健康状况均越来越差;日记中记录发出书信18次,收到书信37次,竭力遵从士大夫社交礼仪;从同时期的《与曾公卷》《答公卷承事简》等书简可知,虽然朋友一再劝阻,他仍坚持服用金石之药,希冀除病养生^⑤。凡此皆说明他在政治迫害中极其珍视自己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存在,以日记见证活着,以活着反抗迫害,以日记写作促成自我的完成。周必大在每部日记前都写了长短不一的序言,还留下了补记的痕迹。如《归庐陵日记》乃记隆兴元年癸未(1163)事,五月己酉日载陈惇等人言行,正文后有小字注,称“后十二年,岁在乙未,三月七日被召,过玉山,陈君相送于此”云云^⑥。足见他事后对日记作了整理,而且写作时预设了期待中的可能读者。他留下的八部日记呈现出良好的个人形象,这是他苦心塑造自我的结果。宋代以来的日记里有着作者们的喜怒哀乐、抱负、欲望、弱点、反思和自我期待,显示出一个个充满内在张力和复杂性的个体。

① 黄铢识语,见黄庭坚:《豫章先生遗文》卷尾,《宋集珍本丛刊》第26册影印清影宋抄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589页。

② 详见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③ 王水照:《“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王水照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3—19页。

④ 王水照:《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王水照文集》第1卷,第20—41页。

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4、106册,第349、63页。

⑥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1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484页。

宋人读日记时往往情不自禁,范成大题咏日记,感慨人生如梦^①;阳枋读亡父《日录》手稿,潸然泪下^②。日记是个人的生命史,作者和读者都通过日记深化了对自我和内在的认识。吕祖谦《庚子辛丑日记》、詹初《日录》等修身进学日记尤其如此^③。这类日记的核心就是不间断的自我规训,其基本模式是按照某种理想(如“成为圣贤”“格物致知”)持续检查、反省、鞭策自己,对自我进行塑造和改造,体现了高度的自我掌控和工具理性,让读者看到一个“自省者”形象,其本身就具有叙事文学“近代性”特征。

日记的第一人称叙事固化、强化了作者的自我审视。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多依赖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和集体叙事,唐代张鷟《游仙窟》用第一人称“余”进行叙述,“余”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处于中心位置,但该小说在中国久失其传,而且在唐代小说中最为特殊,“似乎是一个孤立的现象”^④,未成气候。日记在宋代勃兴,同时也是第一人称叙事在集体崛起,意味着文学中的“我”从集体叙事中挣脱,成为观察、体验、书写世界和自我的主体,在限制性视角中走向个体化、个性化叙事。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五四”新文学中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既接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日记、书信的影响^⑤。确实如此,“现代性”色彩浓厚的第一人称叙事强调限制性、直接性和真实性,这在宋元明清日记中实已早著先鞭。

第二,心理描写。日记的自我审视和第一人称叙事本身就体现着作者的心理活动。论者指出,人们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是因为它具有开启和表征“一个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基本内涵与影响,包括细致深入的心理描写和贯穿全篇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等等^⑥。新文学的这些特征,有些已孕育在传统日记里,第一人称叙事已见前述,心理描写也在宋代日记里渐次丰富。据研究,魏晋小说、唐传奇已见直接或间接的心理描写,但较简单笼统,宋元话本的心理描写则逐渐深化、细化^⑦。宋代日记在这方面也有贡献。周必大《归庐陵日记》隆兴元年五月戊申记述,赴州会时“宛然记旧游”,遂忆起28年前外家犹盛之时,痛感如今之衰败,又想到自己“久失慈训”,诸多女性亲人已无一在者,吟诵“无人论旧事”之句,心如刀绞,不由得“堕泪久之”^⑧。心理活动的曲折变化表露无遗。詹初《日录》“余每常遇事”一段,反思自己必欲去私欲而不得的原因,最后悟到“不期其无私,而自无私矣”,在正反对比、层层深入中剥出内心深处的渴望、苦恼、矛盾和豁然开朗。及于明清,日记中的心理描写更加丰富细致。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一直被认为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其实传统日记中存在大段的内心独白、心理活动尤其矛盾心理的描写,研究日记中的心理描写能更新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认识。

第三,日常化和世俗化。此方面内容前代已见,杜甫、白居易诗中已有此倾向。宋代的情形最为明显,首先因为唐宋之际社会发生了转型,宋人的生活环境与前代差异甚大,而与现代人较接近,宋人笔下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延续到明清民国,有些至今还出现在我们周围。其次是精英阶层中,贵族式微,科

① 范成大:《题日记》,《全宋诗》第41册,第25777页。

② 阳枋:《家忌图序》、《跋谱系图》,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5册,第433、436页。

③ 《宋代日记丛编》未收詹初《日录》。按:詹初本集毁于火,今传其文集乃残本,《日录》原貌已不可见,但书名“日录”,且书中有“上午思‘正心’一章”云云,可推知原本为逐日记事。见詹初:《日录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3册,第402页。

④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01页。

⑤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69—92页。

⑥ 张福贵:《民国文学:概念解读与个案分析》,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⑦ 顾冠华:《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演进轨迹探》,《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⑧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165,第2484页。

举士大夫崛起,后者更加主动地向实际生活靠拢,宋诗遂大规模地从“写日常”转向“日常化”,更加关注日常生活、细微事物和切己情思^①。宋代日记的内容更是如此。前已揭出,宋代日记的一大题材类别即日常生活,即使曾布的时政日记、周焯的行役日记、吕祖谦的进学日记,也多记日常生活和私人体验。前引黄庭坚撰王纯中墓志铭,载其持续写作《日录》48年,内容无所不包,又称“读其书,可知其人有常度也”,用孟子“读其书,知其人”之语评价王氏《日录》,已认识到日记承载着个体生活常态,亦呈现个性与时代。与日常化相连的是世俗化。120卷本《说郛》卷65载明王慎中赞赏欧阳修《于役志》曰:“此公酒肉帐簿也,亦见史笔。”^②道出了宋人的共同价值观:道在世俗生活、世俗生活就是道,衣食住行、劳作玩乐也有着重要意义。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每天记录的都是市井世俗:吃了什么、见了谁、花了多少钱、收到什么馈赠、和谁一起外出沐浴、朋友棋局胜负情况、天气如何……明末贺复徵总结日记的文体特点是“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③,已触及日记日常化、世俗化的特质。宋代日记和宋诗一样,大量记录普通、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市井世俗,提升了个人化、私人化、世俗化经验的地位,标志着世界的舞台不再被帝王将相、国家天下、意识形态等神圣话题所垄断,世俗生活本身获得了独立的价值,历史时间开启了从神圣迈向世俗的进程。日记中对天气、自然现象、物候变化的如实记录,也脱离了天人感应的传统阐释框架,是近代实证精神的萌芽。

第四,近代汉语的使用。受古文运动影响,宋代日记多为雅洁的文言,但也出现了一些使用近代汉语的作品。黎锦熙在20世纪20年代推行“国语运动”时,首倡“近代语”的研究,视“宋元至清约九百年间一大段”为近代,认为近代语“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的国语之基础”^④。他把宋代作为近代汉语的发端阶段,后人或上推到晚唐五代,但宋代处在汉语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是没有疑义的。宋代日记就保留了这样的语料,如北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并别录)》记录与辽朝官员的对话,保留了当时的口语词汇和语法,被今人视为研究近代汉语的珍贵材料^⑤。南宋詹初《日录》使用的是类似《朱子语类》那样的文人口语,如“朱子是个有工夫底人,陆子是个天资极高底人”^⑥,也是早期白话的书面记录。这些日记的语言呈现“文白夹杂”的状态,是汉语近代化的鲜活案例。

第五,读写的庶民化和文化权力下移。宋朝极度重视教育,官府在首都、州县各地广泛设置官学,大幅增加招生人数,官民子弟皆得入学,学规严密^⑦。另有遍布乡村、街道的村学、市学,普通百姓得以就近接受基本教育,能识字、写字、算账、记账的庶民不限阶层身份、无处不在,市民识字率提高,宋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兴起就得益于市民识字率的增长,“实际上是宋代市民文化水平提高的表现”^⑧。精英阶层的日记,如果是沈括、詹初那样的“近代汉语”,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和普及,能阅读的庶民人数应该相当可观。能写日记的庶民亦不在少数。一方面,南宋的学校广泛推行日记教学法,受教育者普遍有过日记写作的训练;另一方面,日记可以任意写作,与庶民日常的算账、记账差别不大,没有诗文那么多的格式规范限制,识字者皆可写成。宋代东南地区以好诉讼闻名,民众为应付可能的官司而在平日里做好各种准备,

① 详见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7—159页。

② 陶宗仪辑,陶珽等重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31页上。

③ 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6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5页上。

④ 黎锦熙:《中国近代语研究法》,《黎锦熙语文教育论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82页。

⑤ 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⑥ 詹初:《日录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3册,第403页。

⑦ 详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6章,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⑧ 程民生:《宋代读书热的兴起及百姓的文化水平》,《人文》第2卷,2019年。

江西歙州(后改名徽州)尤甚:“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①此种系日记录个人隐私的备讼簿书,已可视为日记的“亚文类”。宋代日记的庶民化趋势表明读写活动已从精英垄断转向庶民参与,文化权力逐渐下移。

至此,本文论证了新出秦汉简牍未能否定日记在宋代定型勃兴的既有认知,指出宋代日记的枢纽地位及其蕴含的“近代”因素。考察日记这一“微观史”和“个人生命史”的载体,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作为“中国式近代”的独特性。

The Pivotal Position and Early Modern Tendency of Song Dynasty Diaries

Li Gui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diaries is in the ascendan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ari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iaries of Song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diaries are widely acknowledged to have “emerged in Ta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Song Dynasty”. The regular records on the calendar preserved in the unearthed Qin-Han documents on bamboo and wood have not undermined the general consensus that the diary as a literary genre took shape and prospered in Song Dynasty.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predecessors, Song dynasty diary underwent momentous transformations and achieved groundbreaking advances, exerting a sustained exemplary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Serving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t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ese diaries. Furthermore, Song dynasty diaries developed a number of “early modern” features, thus embodying an “early modern tendency”. An investigation of diaries as a medium of “micro history” and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facilitat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Song Dynasty’s distinctiveness as an embodiment of Chinese-style early modernization.

Keywords: Qin-Han documents on bamboo and wood; Song Dynasty diaries; the pivotal position; the early modern tendency; Chinese-style early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全广秀】

^① 欧阳修:《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6册,第14页。